

戊戌变法难以维新

（一）戊戌维新运动的开展

在鸦片战争后中国人还只是少数人有了朦胧的民族觉醒意识，而在中日甲午战争惨败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关头时，中国人开始有了普遍的民族意识的觉醒。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首先奋起，以“救亡图存”为号召，于 1898（农历戊戌年）发动了一场颇具声势的变法维新运动。

戊戌变法，又叫“百日维新”，是指维新派人士通过光绪帝进行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一次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

案例：“公车上书”

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作为泱泱大国的中国竟为“蕞尔岛夷”的日本所击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1895 年 4 月，三年一次的会试在北京进行。日本逼签《马关条约》，将台湾岛及其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 2 亿两的消息传到北京，群情激愤。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康有为、启超发动在京参加会试的部分举人联名上书，阻止清廷签订条约。康有为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举人共同上书，史称“公车上书”。但都察院以《马关条约》已签字为由，拒绝接收。上书标志着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由思潮转变为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揭开了戊戌维新运动的序幕。

视频：《“公车上书”》

从 1895 年夏到 1898 年春，维新派著书立说、办学会、设学堂、办报纸，介绍外国变法经验，以各种方式宣传变法主张，制造维新舆论，培养变法骨干，组织革新力量。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宣

传、组织和影响下，议论时政的风气逐渐形成。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变法正式开始。变法期间，光绪帝先后发布上百道变法诏令，除旧布新。

从1898年6月11日开始变法至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的103天中，光绪皇帝发布了系列除旧布新变法诏令，史称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各个层面，主要包括：政治上，广开言路，提倡官民上书，裁撤冗官闲衙，澄清吏治，取消国家对旗人的供养等；经济上，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中央设立农工商总局和铁路矿务总局，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创造，改革财政，全国设立邮局等；军事上，裁汰绿营，淘汰冗兵，采用新法练兵，筹建海军等；文教上，废除八股，设立学堂，提倡西学，允许自由设立报馆和学会，派人出国留学和游历等。

随着一系列维新变法措施不断出台，维新派和顽固派之间的矛盾与斗争日趋激烈并公开化。1898年9月中旬，政变已有山雨欲来之势。9月15日，光绪皇帝召见杨锐，并授以密诏，诉说慈禧太后与顽固派反对变法及自己无权之苦，希望他能设法打破保守派和反对派的阻力。维新派商议后想出两个办法：一是拉拢、利用袁世凯，举兵夺权，“围园废后”；二是请求帝国主义者出面干涉。在这些密谋被慈禧太后获悉后，事态急转直下。最终慈禧太后发动了政变，将光绪皇帝软禁于中南海瀛台，史称“戊戌政变”。

慈禧太后下令大肆搜捕维新派。康有为因得光绪皇帝密诏，于政变前一日离京赴沪。当他由塘沽乘英国轮船“重庆号”到上海后，捉拿他的命令已在上海等待他，幸亏英国领事馆帮其脱险，逃到香港。梁启超则在日本人的掩护下化装出京，由天津逃往日本。谭嗣同本来有机会逃走，但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

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他把自己所作的诗文和书稿交给准备逃亡日本的梁启超，决心为变法而死。

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杨深秀、康广仁六人在北京菜市口被杀害，时人称之为“戊戌六君子”。戊戌维新运动至此宣告失败。这场运动迅速勃兴，又戛然而止，终是昙花一现。

（二）戊戌维新运动失败的原因

百日维新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其颁布的政令和措施并未触及封建制度的根本，所要推行的是一种十分温和的不彻底的改革方案。但这场变法运动终以光绪皇帝被幽囚中南海瀛台、六君子喋血菜市口而结束。民族资产阶级何以不能实现维新之梦想？变法举措操之过急，未能妥善处理好与慈禧太后的关系，这些说法均有其合理性，然究其根本原因，主要还在于封建统治阶级顽固势力的强大和资产阶级维新派自身的局限。

封建统治阶级顽固势力的强大，是导致戊戌维新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百日维新期间颁布的各项政令遭到封建顽固派的抵制和反对。尽管这些百日维新政令和措施并未触及封建制度的根本，所要推行的是一种十分温和的不彻底的改革方案，维新派提出的开国会等政治主张也没有被采纳，但仍引起封建顽固派的强烈不满。在光绪皇帝宣布变法的第四天，慈禧太后就迫使光绪皇帝一天内连下三道诏书：免去支持变法的户部尚书翁同龢的一切职务，驱逐回籍；任命其亲信荣禄署直隶总督，不久即实授，统率甘军、武毅军和新建陆军三军；规定凡新授任二品以上大臣，须在皇太后前谢恩。慈禧太后的本意就是想要自己掌控变法局面。

对康有为的奏折和光绪皇帝的一系列关于变法和新政的诏谕，除了某些官员如湖南巡抚陈宝箴能认真执行，湖北巡抚曾链也比较热心之外，其他各省督抚则或观望敷衍，或置之不理，或予以抵制。如两江总督刘坤一和两广总督谭钟麟，对变法期间“谕令筹办之事，并无一字复奏”，经电旨催问，刘坤一声称“部文未到”，谭钟麟则“置若罔闻”。因此，光绪皇帝关于变法的诏谕大部分成了一纸空文。在百日维新的关键时刻，慈禧太后的态度发生了根本转变，开始采取行动扼杀维新变法。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成为定局。

资产阶级维新派自身的局限，是导致戊戌维新运动失败的内在原因。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至19世纪末，虽已经过30年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仍只是零星散落在以通商口岸为中心的城市中，资产阶级的力量仍相对弱小，同时作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成长起来的民族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有天然的联系，这也决定了其必然具有妥协性和软弱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不敢彻底与封建主义决裂。维新派变法的理论依据主要是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希冀借用孔子的权威，打着“托古改制”的旗号，以社会进化思想对传统文化的“不变”思想进行批判，减小变法的阻力。他们幻想通过皇帝的权力和统治阶级内部的“进步势力”，通过自上而下的变法改革，用渐进的方法，以最小的代价，实现社会变革。百日维新期间颁布了诸多有利于促进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条令，但这些内容没有涉及对封建政权和封建土地制度的变革，也没有提出颁布资产阶级宪法、建立资产阶级民权和民意机关的条款，这一方面反映了维新派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这种要求的严重不足。维新派把

改革成败的希望寄托在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身上，及至最后变“民权变法”为“君权变法”，显示出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与妥协性。

资产阶级维新派一向坚持的开国会、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等内容，在百日维新公布的各项举措中却未见踪影，其根本原因在于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妥协和软弱。资产阶级维新派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封建皇帝身上，反映了康有为在政治思想上还不可能完全摆脱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这也是他后来政治上倒退的思想根源。

第二，对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资产阶级维新派虽然大声疾呼救亡图存，却又幻想西方列强能帮助自己变法维新。在“戊戌政变”发生之前，英、日等帝国主义为了和沙俄争夺在华的霸权，曾虚伪地表示愿意帮助中国变法。维新派轻信了他们的诺言，称赞英国是“救人之国”，并奏请光绪皇帝联合英、日对抗顽固势力，这种不切实际的天真幻想自然落空。

资产阶级维新派还向光绪皇帝提议要由东西各国名士来管理中国内政。他们推荐一向为英国侵略利益在华活动的传教士李提摩太担任顾问大臣。当日本的前首相伊藤博文来华活动时，他们又竭力主张光绪皇帝接见伊藤博文，想以此来震慑慈禧太后。1898年9月14日，伊藤博文来到北京。他原想博取光绪皇帝和维新派的信任，借以操纵中国政治，但当他发现维新派的败局已定，遂无意再支持维新变法，只对光绪皇帝和维新派虚表“同情”。9月20日，光绪皇帝接见伊藤博文，希望他协助变法时，伊藤博文答道，“皇上锐意变法。虽不知皇太后圣意如何，但唯恐皇太后与皇上意见一致才能成功变法”。

在“戊戌政变”发生前几日，资产阶级维新派曾向英、日、美寻求援助。康有为请容闳去向美国公使馆求救，他自己则去找李提

摩太，同他起去英国公使馆，请英国公使相助；康有为又拜访伊藤博文，请他向慈禧太后说情。及至政变的第二天，梁启超还去找李提摩太，商量营救光绪皇帝的办法。维新派的这些活动自然得不到任何结果。

第三，脱离和惧怕人民群众。资产阶级维新派是以“为民请命”的姿态自居的，但他们不可能深入民众进行“开民智”的启蒙工作。他们并不了解人民大众，所有的变法措施没有一项涉及农民土地问题。

资产阶级维新派脱离人民群众，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康有为一度对议院充满幻想，但不久即改变观念，明确提出：“不能以西人而例中国。”理由之一即为：民众程度还不宜推行议会政治。维新派对社会各阶层持广泛批评的态度。因而难以在广大社会阶层中找到自己依靠的对象。

资产阶级维新派还惧怕人民革命的力量。康有为幼年目睹过太平天国运动，懂得下层农民起义造反有多么大的威力。他主张自上而下的改良主义的变法，就是要避免革命。他反复提醒光绪皇帝不要忘记人民反抗的危险，在1897年向光绪皇帝上书中明白提出，“即无强敌之逼，揭竿斩木，已可忧危”。在为光绪皇帝编撰的《法国革命史》一书的序言中，康有为力陈革命的可怕，呼吁统治者主动地实行他所主张的变法维新以避免革命。这表明，资产阶级维新派实际上把自己置于人民群众的对立面，这样一场维新变法运动注定将以失败而告终。